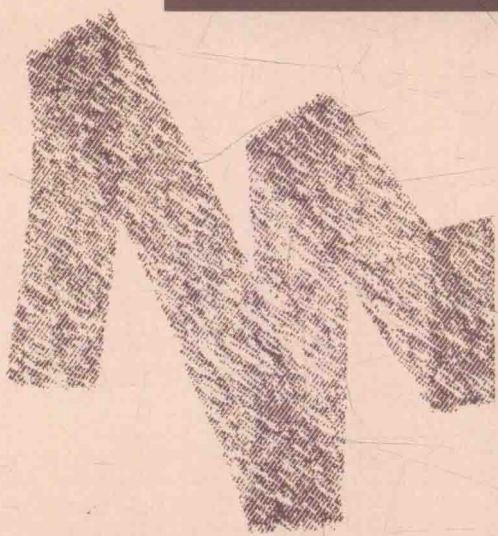


山东女子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诗经弦歌

——音乐文化遗产研究

林 琳 张蛰鸣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诗经弦歌

——音乐文化遗产研究

林琳 张蛰鸣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林琳，张蛰鸣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4
ISBN 978-7-209-08729-2

I. ①诗… II. ①林… ②张… III. ①《诗经》—诗
歌研究 IV. ①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900号

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

林琳 张蛰鸣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开 (169mm×239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90千字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
ISBN 978-7-209-08729-2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诗经》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六经”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尤其对周边邻国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现存多种《诗经》的古写文本，汉、唐时期就远播到日本的《风雅十二诗谱》《乡饮诗乐谱》等《诗经》乐谱在日本都被视为国宝，弥足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经》传入韩国后，韩国文人就对《诗经》进行深入学习与研究，并以此为模式创作了大量本国诗歌，在形式、内容及诗言志等方面与《诗经》有许多相似之处。《诗经》里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也深入到越南雅乐和越南人民的实际生活当中，成为当代越南音乐的重要源头。

我国国内现存的《诗经》音乐文化遗产较为丰富，乐谱主要包括两类：作曲类和诗乐类。前者主要有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风雅十二诗谱》，元代熊朋来《瑟谱》中拟作的《诗新谱》17篇，明代刘廉、聂双江、汪双池等人的拟作；1788年清乾隆皇帝命臣僚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诗经》进行全面谱乐编纂，著成了《钦定诗经乐谱全书》。后者主要是以朱熹、王阳明“天人合一”为代表的诗乐派。这一流派现存比较完整地谱系研究成果，就是由林琳和张蛰鸣著的《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该书着重挖掘探究了山东临清张氏《诗经》的传谱系统。

《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以我国现存的《诗经》音乐文化文献为经，以张氏《诗经》的传谱系统为纬，详细介绍了宋元大儒朱熹、金履祥、许谦嫡传张大公，以及与王阳明父子通家世交的张天瑞家族所传

的《诗经》音乐文献，较为准确、系统地体现了朱熹的诗乐学说，尤其是将音乐、汉字书法之关系在“礼”“乐”和“律”的框架内紧密地联系起来，上承周礼文献记载，下接王季烈在《螭庐曲谈》所论，实现了王季烈在《螭庐曲谈》卷三所说：中国古代“新词甫就，只须点明板式，即可被之管弦，几不必有供谱”的“读诗即歌”“诗乐同体”的诵诗传统。特别是作者从哲学、社会学、音乐学的高度，对张氏《诗经》弦歌谱的原理、乐理、谱系、唱法、渊源、承传等情况，进行了宏大而深入的分析、展示和探究，是一部以中国音乐文化遗产为主题的《诗经》研究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刻意蕴。

《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一书，对《诗经》在我国教育中的历史地位、思想内容类型、歌唱艺术类型、歌唱形式、乐谱构件、节奏旋律、调式和声、语韵乐韵书韵琴韵之关系、曲式、诗乐配器，以及诗乐文化对我国数千年五声音乐体系的影响都做了深入的剖析探讨研究，并对当前如何开发《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促进山东文化强省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设想建议，是非常具有创见性和实践价值的学术思考。

对于《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的出版，我衷心祝贺，深感欣慰。一则为从中国音乐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经典著作《诗经》，使《诗经》又多了一个学术研究的维度，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古代音乐的学科领域；二则为欣喜地看到像林琳、张蛰鸣这些热爱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学者，能够坚守学术理想，耐得住寂寞，孜孜垦恳以求，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矿藏，不断带来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我深受启迪，备感鼓舞，对新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传承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加充满了信心。

是为序。

王志东

2015年3月1日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化名家）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诗经》艺术	5
第一节 《诗经》在我国教育中的历史地位	6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类型	12
第三节 《诗经》的歌唱艺术类型	16
第四节 《诗经》的歌唱形式	19
第五节 现存的《诗经》音乐文化遗产	22
第二章 张氏《诗经弦歌》传谱构件	26
第一节 礼乐同阶的音符	26
第二节 与天地同节的节奏旋律调式和声	32
第三节 语韵乐韵书韵琴韵	38
第四节 诗乐舞一体之神韵	48
第三章 张氏《诗经传谱》韵唱方法	53
第一节 张氏《诗经传谱》诗唱吐字法	53
第二节 《诗经》的韵腔和乐	59
第三节 正腔和副腔相结合的唱法	67
第四节 歌随心走的节奏处理法	68

第五节 《诗经》中六书和修辞手法在诗乐一体中的运用	69
第四章 诗韵音乐结构类型	77
第一节 诗韵音乐结构类型概述	77
第二节 诗韵在句中的位置类型	78
第三节 《诗经》中一韵到底的乐段类型	84
第四节 《诗经》中偶句韵的乐句结构类型	90
第五节 《诗经》中句句用韵的乐句结构类型	93
第六节 韵的位置和调	99
第五章 特殊韵字的解音化乐	102
第一节 关于遥韵化乐	102
第二节 双声叠韵叠句的化乐类型	106
第三节 《诗经》中的虚字词头化乐	112
第四节 《诗经》中的虚字词尾及虚字脚化乐	115
第六章 张氏《诗经弦歌》的和声	124
第一节 声部和织体	125
第二节 一唱众和的类型	128
第三节 多声部类型	137
第七章 张氏《诗经弦歌》传谱曲式	142
第一节 曲式是时代需求的产物	142
第二节 张氏《诗经传谱》与杨荫浏先生考证《诗经》的 十种曲式	143
第三节 张氏《诗经传谱》的其他曲式	152
第八章 诗乐的配器	162
第一节 《诗经》里的乐器	162
第二节 《诗经》中乐器的分类与配器使用	168

第三节 张氏《诗经弦歌》音乐配器源流及影响	174
第九章 诗乐文化造就了我国数千年五声体系优秀音乐传统	185
第一节 易经哲学思想为我国五声音乐体系作了顶层设计	185
第二节 礼乐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五声音乐体系长期存在 提供了社会保障	188
第三节 儒学教育体系对诗乐舞一体及五声音乐系统的保持	198
第四节 古代诗乐“天人合一”思想在张氏《诗经弦歌》中的 体现	208
第五节 古代诗乐“济民养生”思想在张氏《诗经弦歌》中的 体现	218
第十章 张氏家族《诗经弦歌》传承谱系	234
第一节 元代遗存	234
第二节 明宫廷文化对张氏的影响	237
第三节 明藩王府文化对张氏的影响	240
第四节 明清国子监和乡饮酒礼文化对张氏的影响	245
第五节 民国以来的余响	254
第六节 张氏十九世传人张金栋	260
第十一章 张氏《诗经弦歌》的意义及开发	264
第一节 鲁西北弦歌自古繁盛不衰	264
第二节 现代鲁西北民间音乐活动	268
第三节 张氏《诗经弦歌》的意义	270
第四节 《诗经》弦歌文化的开发	271
参考文献	275
后 记	282

绪 论

山东临清胡里庄张氏家族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自家族伊始便以《诗经》等各种诗词曲赋作为主要教授内容教育后代。

山东临清胡里庄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已有 700 多年，在临清市中心东 7.5 千米、原清平县政府驻地西 30 千米处，历史上为两县交界处，位于古齐国西部。胡里庄 1956 年以前属清平县。1956 年清平县撤销，胡里庄划归临清。临清、清平音乐大家历代辈出，如唐代音乐家吕才、明代太常寺卿张鄂、刘廉、诗人谢榛等。文化遗产有羯鼓、清平剧（柳子戏、吹腔）、山东快书等。《论语》中有孔子的学生子游以弦歌治理武城的记载。武城现有弦歌台、弦歌古渡和许多古人诗文遗迹。临清、清平、高唐、武城，唐后属东昌府（聊城）。《老残游记》第七回借书店掌柜的口称道：“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是著名。所管这十县地方，俗名叫做‘十美图’，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户户弦歌。”自 1411 年，惠通河疏通以来，临清成为各种俗曲小令的集中地。明人谢肇淛《五杂俎》中，就有“京师中之小唱半属临清”之说。明代陈洪谟、张瀚所著《松窗梦语卷二·北游记》有“自临清之武城，即弦歌古渡”的记载。

据《清平县志》、张氏家谱记载，张氏最初始祖张挥是“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因“始制弓矢”，“赐姓张氏”，“官为弓正，世掌其职”。唐宋以前，家谱记载完备，金兵南侵，家谱被毁，史料就此中断。现临清张氏一世祖张大公的父亲张士亨系堂邑人，进士出身，曾任河南巩县知府。张士亨生有五子，一曰大舍，二曰二舍，三曰三舍，四曰四舍，五曰五舍，五支家谱现俱全。张士亨由何支衍续，尚待考证。大舍，即张大公。张大公为至元年间人

(约1290~1375)，“少时耕读，与金履祥先生(1232~1303)、许益之先生(1269~1337)往来相善”。元仁宗时出仕，官至万户侯，所组不和，辞官隐居，携两个儿子由堂邑迁居到清平县城西胡刘庄(胡里庄)，耕读为乐，绝不言仕。据《宋史》卷四三八、《元史》卷一九八载：宋代儒学大家由程颐、程颢—朱熹—黄干—何基—王柏—宋末元初金履祥—元许谦(字益之)代代相传。其中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雍正二年(1724)被钦定为曲阜孔庙七十三大儒之内。张氏家谱所记张大公学问源头和上述文献所载承传关系完全一致，并说“其所得于二先生(金履祥、许谦)者深矣”。张大公的儒学源于程、朱正统儒家一脉，其“治《诗经》”学问可以说得当时大儒真传。^①

张氏五世张天瑞(1451~1504)，字文祥，号云坪，明成化十三年乡贡进士，殿试时王阳明之父王华获头名状元，黄珣获二名榜眼，张天瑞获三名探花。张天瑞初授翰林院编修，纂修《宪宗实录》，后升侍讲充经筵讲官，遂迁右中允兼春官储帝讲读官，秩满升左春坊左庶子继修《资治通鉴》，因辛劳成疾，身染风寒卒于京师。遗有诗文《云坪集》四卷、《经筵讲义》、《东宫讲读》行世。^②

明代，张氏和王阳明父子通家世交。张氏家族五、六、七世多人在朝廷及彰德赵王府做官，家学深厚，绵延至今。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册《云坪曲折谱》抄本，据张氏老辈人说是张天瑞为教授子女撰写的，共三卷。卷一从汉字结构、中国音乐音阶和事物认识论等角度，论述书法、汉字与音乐的转换关系；卷二从阴阳等方面讲解书法节奏和音乐节拍；卷三介绍诗词、书法、音乐、舞蹈的联动关系，并附有“五音笔阵图”“板眼定则图”“九宫方位音律图”“五音宫调配属图”等图解。此外，书中还收有《诗经》《楚辞》《事林广记》等古籍。诗词曲赋中有不少用朱笔标着书法乐谱，另外还有两册《诗经唱谱》和一本《五律乐谱》抄本残卷。

数百年来，在张氏家族中流传着书法乐谱。书法乐谱在承传过程中有着不同的称谓。民国《清平县志》在“游艺·社伙”中称其为“渔家傲”，主要流

① 《民国清平县志》“艺文、碑记”第35~36页，《张大公行谊记》，清邑举人汤任尹撰。

② 《民国清平县志》“人物、乡贤上”第17页，《张天瑞传》。

行在文人雅士阶层，聚会时歌唱诗词为乐，其中词牌《渔家傲》影响最大，故称。在张氏家族中的称呼还有多种：一曰诗仙谱。据说唐代的文人才子们为了求取功名，往往向达官贵人现场献诗，并乘机展示自己的书法、音乐等诸种才能，集诗、书、乐、舞于一身，又歌又写又舞，以博得赏识，李白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故有此称。二曰李字谱，音阶符号能用“李”字准确地解读出宫商角徵羽，传说李字谱是老子传下来的，老子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且把老子称作自己的祖先，故称。三曰明皇谱。文献记载唐明皇作《羽衣霓裳曲》《献仙音曲》均用此谱，所以又称明皇谱。清平人吕才为李世民创作《秦王破阵乐》，就是按阴阳理论进行的。此外，还有尔雅谱、探花谱、秀才谱、唱秀才等名称。张氏所传书法乐谱主要用于提高孩子们的素质和读书兴趣，应付科考，谋取功名。张氏家族的书法乐谱按四声五音排列汉字，以首画解音，朗诵音节和情感定节拍，平声字和仄声字分别按字调规律唱一至多音；一字多音吐字后唱韵，实现了中国古代“读诗即歌”的传统。

正如郭预衡对张金栋所说：“书法乐谱的价值就会解读唱奏，它是个体系，而且是活的。……是一笔很重要的文化遗产，它不是凭空来的，孔子就是个典型，诗、书、礼、易、乐、春秋，琴、棋、书、画、舞、武，他什么不精？朱熹、金履祥、许谦、王阳明是这样的人。张天瑞当然也是这样的人。他是东宫侍讲，也就是皇帝的老师，史文献还说他有‘经济之才’，未及施展就因劳累过度病逝。什么是‘经济之才’？就是治国济民的才能。……王阳明的《尊经阁记》中，他把诗、书、礼、乐、春秋、和易的关系讲得特别清楚。……在书法、诗乐和乐谱的关系方面，朱熹在《朱子七经语类·礼四·乐记》开头说：‘看《乐记》，大段形容得乐之气象，当时许多形名度数，是人人晓得，不消说出，故只说出乐之理。’这个‘形名度数’，应该是乐谱，而且‘人人晓得，不消说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诗、书、礼、易、画、乐、舞、剑、医，等等，它们不仅是一项艺术或技能，还反映出了一个人的风格。各朝各代学者中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能书、能文、能歌、能画，会击剑，懂医道，琴棋书画样样通。……书法乐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把诗、书、礼、易、画、乐、舞扭到一起，学一知十，而且是乐而习之，要好好深入研究，一定会有成果。”

张氏家族所传书法乐谱之《诗经弦歌》，其音阶、节奏等要素和构件完全符合朱熹在《朱子七经语类·礼四·乐记》说的“是人人晓得，不消说出”之理，准确地体现了朱熹的诗乐学说，同时也体现了王阳明教歌诗“教约”中所展现群歌群唱的一唱众合的歌诗场面，也印证了比张氏稍晚的朱载堉在《乡饮诗乐谱》卷六所说：“古诗存者三百余篇，皆可以歌，而人不能歌者，患不知音耳。苟能神解意会，以音求之，安有不可歌之理乎？臣尝取三百篇诗一一弦歌之，始信古乐未尝绝传于世。”“《诗经》即《乐经》”^①将音乐、汉字书法之关系在“礼”“乐”和“律”的框架内极其准确地联系起来，上承周礼文献记载，下接王季烈在《螭庐曲谈》所论。张氏十九世张金栋历经20余载，以张氏家族所传《诗经》弦歌谱的原理为基础，整理了中国古代诗词曲赋古谱数百万字的原理、渊源资料，并将《诗经》逐篇点谱，实现了王季烈在《螭庐曲谈》卷三所说：中国古代“新词甫就，只须点明板式，即可被之管弦，几不必有供谱”的“读诗即歌”“诗乐同体”^②的传统，有较高的学术研究和推广应用价值。

为弘扬中国传统的诗乐文化，我们以我国现存的《诗经》音乐文化文献为经，以张氏《诗经传谱》为纬，在张金栋先生指导下，编纂了这部《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研究》，通过解读张氏家族传谱，全面介绍《诗经》弦歌音乐文化遗产，也算是向读者展示古人唱诗秘密的一家之言。

① 朱载堉：《律吕精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页。

② 王季烈：《螭庐曲谈》，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第一章 《诗经》艺术

六经是《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等六部经典的统称。其中,《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周代“诗乐舞一体”的活动是非常流行的。后来,据说《乐经》被秦始皇焚毁而失传,只剩下五经。宋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张氏家族民国《诗经弦歌》传谱



张氏家族所藏明代《诗经弦歌》标谱

第一节 《诗经》在我国教育中的历史地位

翻开《诗经》，我们可以看到，《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诗的三种体制。朱熹在《诗集传》序里说：

“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

“颂”者，宗庙之乐歌。^①

《诗经》中的歌词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我们知道，诗歌起源于劳动生产，最早的劳动歌谣是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吕氏春秋·古乐》里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②。

《诗经》里的“风”即民歌，本就来源于民间，它与音乐的关系可以想象。“雅”是贵族宴乐歌曲，《诗经·小雅·钟鼓》里说到奏乐时也说“以雅以南”。“颂”是国家祭祀之乐。所有这些都说明《诗经》里的诗原来都是配乐歌唱的。现在一般认为“风”是乐曲的名字，所谓“国风”就是各国的乐曲，犹如我们现在说的山西调、河南调等等。《诗经》里的国风有十五种，就是有十五个地方的乐曲，所涉及的地区几乎占大半个中国。为什么把各地方的乐曲叫作“风”呢？这确实与“风”字的本义有关。风触草木有声，其声有高低、大小之分，有如音乐的抑扬顿挫，所以把乐曲说成是“风”。

“风”是乐曲的名称，“雅”也是。“雅”就是朱熹说的“正乐之歌”。为什么是“正乐之歌”？

所谓“雅”是相对地方音乐而言，“风”起于民间，当然不“雅”、不“正”。那么，如何“正”呢？当然用“雅”来“正”。“雅”主要来源于西周王都附近的音乐，其充分体现着统治阶级的“礼”。

“颂者，宗庙之乐歌”，当然更是“礼”的最高化身，朱熹的说法是正确的。“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等级的礼乐。

① 朱熹：《诗集传·序》，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

② 《吕氏春秋·古乐》，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总之，“风”是最初的民歌，但后来被“礼”化了。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礼”化的“风”。这些古音乐的原始曲调在当时就已亡佚。但在记录歌词的唱本——《诗经》里还保留有“风”“雅”“颂”三种音乐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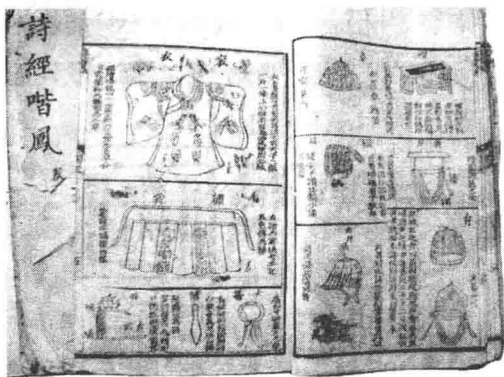
一、《诗经》在周初诗乐舞的舞台上始终占主导地位

现存《诗经》中，“风”诗有160篇作品。“雅”诗里有“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作品。“颂”诗里有“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诗经》存诗305篇。但“小雅”里有6篇作品——《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有目无文，这就是所谓“笙诗”，就是器乐曲。

《诗经》在周初集“诗乐舞一体”，经过周公制定周礼加以“礼”化，在诗乐舞的舞台上占主导地位。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由于周代中后期“礼崩乐坏”，经孔子逐篇“弦歌”“正乐”“删定”“编辑”，并教习弟子，后大行天下，流传于世，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同样在诗乐舞的舞台上占主导地位。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是对先秦文化成就的总结和升华，又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道路总是曲折的。秦朝在推行大一统制度过程中，实行了一些过激的政策，秦始皇为钳制人们的思想，实行愚民政策，“焚书坑儒”，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得以幸免。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虽不重视儒学，但诗乐舞文化活动并没有中断。如，刘邦衣锦还乡，创作《大风歌》的活动就是“诗乐舞一体”活动的实证。至惠帝时，废除“挟书令”，儒家思想言论这个禁区开始松动。从这时起，到文帝时期，一些尚存的老儒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弟子们因找不到书籍，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将老儒背诵的经典本书和解释记录下来，这样的经典就是所谓的“今文经”，释文谓之“传”。文帝时，开始设置经学博士，由今文经学家充任，以备顾问。武帝时，置五经博士，亦由今文经学家充任，在太学教授弟子，并建立了乐府机构。从此，今文经学得到广泛传播，诗乐舞一体的活动得到一些恢复。

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今文经



古版《诗经》

来自老儒的记忆，因每个老儒的记忆有出入，解说有差异，于是出现了一经有几家说法的情况，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些学术流派。汉宣帝时，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二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为十四博士。齐人轅

固传《齐诗》，鲁人申培公传《鲁诗》，燕人韩婴传《韩诗》。三个解说《诗经》含义的学派，同属今文学派。西汉时曾为三家设学官（博士）。现均已亡佚，仅存《韩诗外传》。

秦在焚书时，人们将一些儒家经典和其他一些古书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由于拆除老房，相继发现了一些古书。武帝时，下令献书。成帝时，设官负责收集古书，并着手进行整理。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重视。

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古书时，发现古文经典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而且篇章也多出不少。如《礼》多39篇，《书》多16篇。《毛诗》和《春秋左氏传》等则为今文经所不载。

《毛诗》的发现，使西汉研究《诗经》形成齐、鲁、韩、毛四家。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穀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予合法地位。刘歆建议在太学立学官，但却遭到今文经学博士们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这些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未被采纳。今文经学博士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

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进行“改制”，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个博士。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民间却广为流传。古文经中固然有些内容是经过两汉学者窜改或增加的，但总的说来，古文经学家是按字的形、音、义解经，极力恢复经的本义，不做任意发挥，于是形成了系统的训诂方法。古文经学家贾逵、马融、郑玄兼通今文经。郑玄破除各家传统，广采众说，遍注群经，得到今、古文经两派的赞许，号称“郑学”。至此，基本上结束了今、古文经的斗争。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学派，引经据典，反复考证，用了22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9353个，收古文（战国文字）、籀文1163个为重文：每个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540部，全部解说不过133000多字，简明扼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

二、西汉以后，官学以解诗义为主，诗乐舞一体逐渐分离

《汉书·艺文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东汉郑玄《诗谱》《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等书记载：至战国初期，研究讲习《诗》者，有齐人辕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河间毛亨。“毛亨著有《毛诗正义》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毛亨将《毛诗正义》传授给毛萇。《诗经》之所以能够流传今日，毛亨、毛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国时期吴人陆机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孔子删书授卜商，卜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卿授鲁人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萇，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萇为小毛公。”^①而唐代陆德明著的《经典释文》序中有不同记载：“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②

综合史书、方志、文物、古籍、传说等方面的考证，可以肯定的是，在河

① 丁晏校正：《续四库全书·经部·诗类》（卷下），第457页。

② 丁晏校正：《续四库全书·经部·诗类》（卷下），第458页。